



■追 忆

立德树人 守心育人

——深切悼念恩师程树榛先生 □陈玉福

我愿不愿意赴京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?至今我还记得受邀当时心跳如雷的感觉。挣脱商海牵绊,我没有去原单位报到,而是毅然踏上了去首都追寻梦想的道路。“国刊”《人民文学》的采编组长是一个响亮的名头。我兴冲冲入职,先生第一时间找我谈话,毫不留情给我“泼冷水”。他告诉我,“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”,采编组长这个头衔只能为你下去采访提供便利,是帮助你深入生活、深入群众的一个通行证。也就是说,你要沉到最下面去,去和老百姓一块工作、一块生活。这样你才能写出反映最基层老百姓声音的作品来。同时,还要善于发现一些最基层的创作新人,因为他们也是我们文学的主力军之一。经先生语重心长一番点拨,我才知道,下去采访不但是我的工作,也是一种磨砺。他说:作家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,应该走出书斋,通过采访走出去,成为群众中的一员,才能看到人生百态,才能听到基层最真实的声音。经此恳谈,我恍然大悟,茅塞顿开。

由于《人民文学》采编组长的身份,下面的机关单位、企业都非常给我面子。头一年,我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。第二年,我到天津市大邱庄采访,采访了大邱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禹作尧,也采访了禹作尧的前任当年在大邱庄创业的同伴们与父老乡亲。从那开始,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1号会议室》的故事就住进了我心里。直到这个故事扰得我吃不香睡不着的时候,先生发现了端倪,他约我谈话。

一个冬日的下午,我应约第一次到潘家园华威北里先生的府上拜访。一进门就被素简、充满书香之气的家居生活所感染。先生非常健谈,与我讲起他的家乡江苏邳州,讲他的童年,还有他的文学生涯。先生出生于破碎的旧中国,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只有四五岁,还是一个懵懂稚子。等到上学年龄,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困难时期,他耳闻目睹父辈们为抗日战争奉献的种种,那些英雄的故事不断激励他成长,他暗下决心,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。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,于新中国解放初期,他考进了天津大学学习机械专业。大学毕业,他被国家分配到东北的第一重型机器厂工作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大学时代》。这部小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第一时间出版,直到1980年才与读者见面,可谓好事多磨。上班后,先生从小小的技术员干起,以过硬的技术、无私奉献的精神,做到了厂里的工程师。因为爱好文学并且写了不少关于工厂技术革新的文学作品,被厂里发现后调到了厂党委宣传部工作。从此,他一边工作一边创作,因为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,他的作品里生活气息浓郁,刻画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,被上级提拔到了宣传部长的位置。几年后,由于创作成绩突出,先生调任黑龙江作协,先后担任过省作协主席、省文联副主席、《东北作家》主编等职。后来,他奉调中国作家协会,担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

专业从事文学工作几十年来,先生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数百

万字,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钢铁巨人》《大学时代》《遥远的北方》《生活变奏曲》等,其中《钢铁巨人》影响深远,被改编成了电影搬上银幕。他的报告文学《励精图治》获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,部分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出版发行。

与先生长谈,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。于是,我大胆提出了我的困惑。先生听了非常高兴,他说:这就说明,你通过采访到手的素材已经积累不少了,现在如果不马上写出来,等过了这个时期,你再写恐怕就没有这个激情了。说到这里,他再次强调邀我来《人民文学》工作的初衷,他说:“让你做这个采编组长,不是让你奋斗几年端一个吃饭的碗,而是让你到各行各业去采访,扎扎实实了解社会与人民,为人民书写,你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作家。”

在此之前,我已经明白先生让我到《人民文学》来工作的苦心,这天下午他推心置腹给我讲他的经历、他的创作和他的作品,令我获益匪浅、备受鼓舞。当天晚上,推掉一切应酬,我埋头书案开始了长篇小说处女作的创作。因为故事在心里已经十分成熟,二十几万字的作品,写了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。初稿完成后,我迫不及待送去给先生过目把关,先生却并不急于翻看,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,就是让我回去大声通读三遍,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了再去找他。我略有不解,但还是按照先生的要求照做了。在朗读自己的作品时才发现,里面还有许多细节和文字需要大加修改。十天后,我拿着仔细修改过的书稿再次找到先生,这一回先生欣然接下了。三天后在他的办公室,他告诉我,这些年来他已经有过把一部长篇小说一口气读下去的情况了,这部作品是一个特例。他对我说,你拿着我的推荐信去找出出版社的社长吧。得益于先生的推荐,很快,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1号会议室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这部书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,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,半年时间内重印了八次,我亦有了“1号作家”的虚名。至2005年,短短五年时间,《1号会议室》好几个版本在不同几家出版社出版,累计印刷发行了60多万册。《1号会议室》出版后,我去先生家里致谢,先生说:这也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,我只是尽了一点心力而已。他还是谦逊依旧,而我学会了认真严谨。这么多年来,每当完成一部作品,我还是坚持通读三遍修改得自己满意了才交付出版社,这个习惯至今保留,这都得益于先生的谆谆教诲。

先生走了,他的遗愿是:不开追悼会,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骨灰撒入大海。他洒脱了一辈子,把自己的身后事也安排得云淡风轻,而我因为疫情,不能到北京去送先生最后一程,只能凭此短文深切哀悼,殊为遗憾。

先生一生襟怀坦荡,宽人律己,工作勤勉,廉洁奉公,家风严谨,正直善良。他为中国文学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,死后而已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也为我们这些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先生值得我们爱戴和尊敬,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10月30日,北京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,他开门见山地说:程树榛老师走了……

“啊?”我一下子翻身坐定:“确定?”朋友认真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,我这才相信,我的恩师程树榛先生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惊闻噩耗,“困”在“深扎”地甘肃张掖的我,瞬间泪雨滂沱……人世上最残忍又最令人伤痛的事情莫过于挚友之间的生离死别。先生于我,亦师亦友,谊切苔岑。新闻简讯中的报道只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离世,对于我而言却是切肤之痛,程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眼前。

二十多年前,初晤先生的深切记忆依稀历历在目。那是1997年初,不惑之年的我还是边陲小城里一个痴心不改的文学发烧友,商海浮沉为家计打拼之余,每月会按时收到《人民文学》这一充盈灵魂的精神食粮,彼时程先生正是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是公认的中国文学井喷期,每一期《人民文学》到手,我几乎都是如饥似渴地去阅读,咀嚼其中真味,从中汲取文学养分。向《人民文学》大胆投稿,是我自认那一年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。文稿寄出后望眼欲穿,一边担心石沉大海,一边又忐忑着会收到退稿信,那种矛盾心情非此一般经历者不可感同身受。我从来都不认自己是命运之神眷顾的幸运儿,中篇小说《马莲花》能够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,也佐证了立世为人脚踏实地的真理。从此,我与先生相识,凭借鸿雁传书竟也成了忘年交。先生为人谦逊耐心,身为“国刊”主编没有任何骄矜高傲,他总是在书信中对我给予文学上的指导,并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人生经验一一传授。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我与先生定期通信谈论文学,也谈论人生,虽未见面已是神交久矣。

是年底,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马莲花》付梓前,我邀请先生作序,先生毫不犹豫便欣然应允了。这篇序言发表在《甘肃日报》百花副刊头条位置,一时引起关注。我知道,这是先生对一个晚辈的鼓励与提携,正因为他的肯定,我迈向文学之路的脚步更加坚定。

1998年,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。下海多年身心俱疲,精神的游离与岁月的蹉跎,让我找不到未来的方向。我将内心苦闷迷茫无数泄于一纸书信,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先生。不久,先生特意打来电话,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电话交流。脱离文字直面对话,我们互相操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谈了半个多小时,未了,先生问

■创作谈

对历史负责,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使命

□黄柳军

文学的两种价值

回想起创作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的艰辛,如果还能说点创作谈什么的,我只能说:一是“无悔”,二是“感恩”。

无悔的是什么?从2018年7月起,我带着光荣使命和神圣嘱托,进入扶贫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,到2020年1月“退役”,日夜战斗了一年零七个月。面对如此宝贵的人生体验,我无悔曾经的一切努力和付出。感恩的又是什么?我感恩帮扶村子里憨厚的人们、清脆的鸟声,动人的泉流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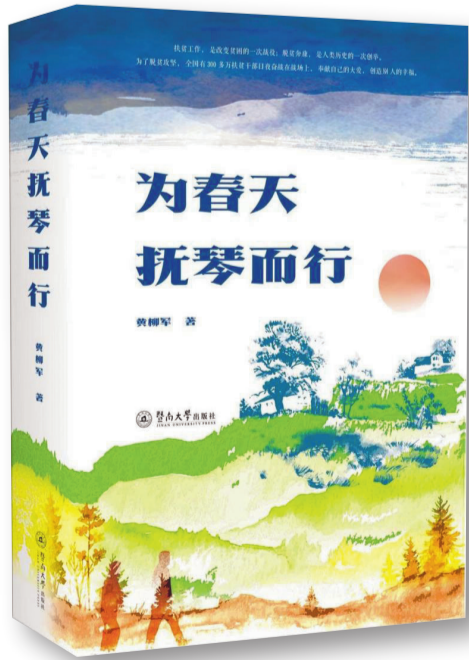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,把驻村干部比喻成新时代的战士,看成英雄,一点儿也没有夸大。他们远离城市的家,成天扎在穷人堆里,落实政策、精准扶贫,成天入户走访,给贫困户送去温暖、送去改变生活的法宝。

作为曾经的一名驻村干部,很多感受是深刻的。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以一个驻村干部的亲身经历,客观描绘新时代战士的生活点滴,再现他们为了率领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,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牺牲,像飞蛾一样扑进光明的路途。我认为,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在艺术价值之余,还需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关于小说的人物和故事

小说的人物塑造方式多种多样,外貌描写、语言描写、动作描写、心理描写等都可以用来塑造人物,且每一种描写都会给小说带来不同的效果。对于人物塑造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利用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描写,尽量使人物丰满、生动,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这部长篇小说,除了反映驻村干部的形象,我还主要着墨于那些



“真言”“真心”留住历史

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这部长篇小说,以一个驻村干部的视角来诠释驻村生活和扶贫工作,留住那段难忘的历史。

在创作过程中,我重新翻阅了大量与扶贫工作相关的政策和文件。作为曾经的扶贫干部,我对那些政策和文件精神已有深入理解。如果自己连“八有”“两不愁三保障”都不知道,吃不透政策和文件精神,怎么可能顺利完成扶贫题材的创作?对于创作者来说,唯有“真言”,才是正视历史、尊重历史的表现;唯有“真心”,才能做到不愧对历史。如果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这部长篇小说中提到扶贫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事情或难题,日后有幸被那位驻村干部看到后说“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”“我也发现了那样的问题”“我当时也有这样那样的担忧或想法”,我想我使用笔下的文字留住了那段历史。

脱贫不忘扶贫人

来到水源村后,我基本每天坚持写日记,这些日记成了我创作《为春天抚琴而行》的原始素材。全书由两条主线构成,一条是主人公王悦与前任万队长因一件小事闹矛盾,给扶贫工作造成一定影响,后来他与新队长同心协力,目标一致,彻底改变了水源村扶贫工作难以开展的现状;一条是因受虎山村地理环境影响和自然条件约束,扶贫产业项目迟迟落实不下来,后来经过新任队长和王悦的共同努力,最终实现了村民的愿望——建立扶贫产业项目。

脱贫不忘扶贫人。全国有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向贫困发起冲锋,他们的努力应该被看见,也应该被记录下来。

早就听说过作家钱锺书到过宁都。宁都是赣南山区,不靠大江不临大城,他去干嘛?对于我来说,这始终是一个谜。在查阅当地一些文史资料后,我发现钱锺书来宁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。因工作之便,二十多年前,我访问了宁都北门几个耄耋前辈,记忆中他们也说到钱锺书来过宁都,而且在长庚门与三官殿之间的一家公营的“陶陶旅馆”歇脚并寄宿了一个晚上。

那是1939年秋天,南方天气转凉,依山临水的枫树映衬出一片烂漫,清一色的红。钱锺书先生在父亲钱基博的要求下,应湖南蓝田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之聘,偕同徐燕谋、张贞甫、邹文海等五人,先从上海“走水路”,坐船到宁波,然后换乘人力车到淡水口,再乘汽车到金华,从金华乘火车南下鹰潭,在此搭公路汽车来到南城并直线进入宁都。在宁都这块多情且人文底蕴至深的土地,也许钱锺书有所眷恋,刻意留宿一晚,最后经兴国赴吉安,在荒僻的小站换乘湖南公路汽车入湘,由耒阳到邵阳,改乘轿子抵达安化县的小镇蓝田。

南城至宁都,距离不远,但也要跨南丰和广昌两个县,这中间的路程也有三百余里。旅途疲乏的钱锺书一行在宁都北门亭子岭脑的汽车站下车,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条潺潺河溪(龙变溪),溪上有一座拱桥(北宋拱辰桥),过了桥便是一片泛着秋光的水塘和依山而立的枫树林,山坡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“三官殿”,殿是祭祀“三官”(天官、地官、水官)的,实则就是尧舜禹三大圣贤。钱锺书喜欢这样的“自然环境”,他二话不说,揸着行囊拖着倦意就跨过拱辰桥,来到枫林坡上的“三官殿”信步而行。这边可谓是南方罕见的宜居小城,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叠,真是美不胜收!钱锺书瞬间对这里有了兴趣,塘与溪、山与林、桥与殿,勾勒出宁都匠心独特的气韵。时为国难当头战事吃紧,抗日硝烟处处弥漫,沿途都是萧瑟的残景,还有千疮百孔的哀号,唯有这方天地是清静!年轻的钱锺书流连忘返,古老的“三官殿”是单檐砖木结构,顶部覆有黑筒瓦、板瓦,匾额是木雕篆书长方形。据说,匾额题字是元代著名书法家、文学家周伯琦所为。这位江西人题写的“三官殿”笔力雄健,结构极其稳健,只此三字,如丽人仰望月、秀发垂柳,足可见笔可扛鼎的功力。对于奔波数十日(有记载钱锺书从上海出发到湖南蓝田,这中间一共走了34天)的钱锺书来说,这里无疑是一块难得的“净土”,拂去一路尘土,在闹中取静间,想起了妻女,对她们无限牵挂,并赋诗一首——

宁都再梦圆女

汝岂解吾觅,梦中能再遇。
犹禁出庭户,谁导越山河。
汝祖盼吾切,如吾念汝多。
方疑背母至,惊醒失相河。

其间的钱锺书年富力强,才29岁,恋家是本能。他在诗里不说自己想女儿,倒说女儿想自己,孔席墨突,翻山越岭进入我的梦中;你这么小,定是瞒着母亲出来的,与你相见,虽慰我梦魂,却让母亲担心;我也是时时把你挂念在心头啊,就像你爷爷盼我急切一样啊!短短40个字,把三代人中的父子之情、父女之情、夫妻之情、母子之情尽收诗中。后来,这首诗也让小不点的宁都,以标题的形式赫然呈现在钱锺书的诗集《槐聚诗存》中。

当晚,钱锺书一行就住宿在附近的“陶陶旅馆”。陶陶旅馆是公办的,时为当地“第二招待所”,钱锺书住进后,甚感舒适,一个晚上好梦连连,就连这家招待所的牌子也变了样,“宁都招待所”居然成了“陶陶旅馆”。诗经《国风·君子阳阳》曰:“君子阳阳,左执簧,右招我由房,其乐只且!君子陶陶,左执翫,右招我由敖,其乐只且!”第二天,他们打点行李准备离开时,钱锺书把昨晚的好梦分享给大家,在结算盘账时,还特意给掌柜的讲了第二招待所易名“陶陶旅馆”的“梦里故事”。也许这一晚的梦对钱锺书来说有特别的意思吧?根据一路深切艰辛的体验,他后来把它“搬进”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中,经过任意点化,妙趣横生,其中第五章用了两千五百多字的笔墨讲到了宁都及宁都的遭遇,“陶陶旅馆”自然出现在《围城》里。

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作者自己,方鸿渐一行从南城坐汽车到宁都后,虚演出许多故事,同往寡妇的仆人阿福吃了旅馆用桐油炒的菜呕吐不止,让有醋意的李梅亭大乐不止;房间有限,方鸿渐睡在辛楣与柔嘉中间的竹榻上,让他想翻身又不敢翻身,起身灭灯,看着熟睡的孙小姐脸色变红,吓得急忙溜回,惶恐了半天;



□温谈升

为等行李和去吉安领汇款的事,方鸿渐与李梅亭吵得一个嘴里出热气,一个鼻子出冷气。小说写旅途艰辛,必然虚虚实实,抓住不如意处写。虽非宁都的实况,确实让宁都在读者心中扎根,人们在地图上寻找宁都,钱老功不可没!

小说这样叙述——

车下午到宁都。辛楣们忙着领行李,大家一点,还有两件没运来,同声说:“嗨气!这一等不知道又是几天。”心里都担忧着钱。上车站对面的旅馆(陶陶旅馆)一问,只剩两间双铺房了。辛楣道:“这哪里行?孙小姐一个人一间房,单铺的就够了,我们四个人,要有两间房。”孙小姐不踌躇说:“我没有关系,在方先生房里添张竹铺得了,不省事省钱么?”看了房间,掂了东西,算了今天一路上的账,大家说晚饭只能将就吃些东西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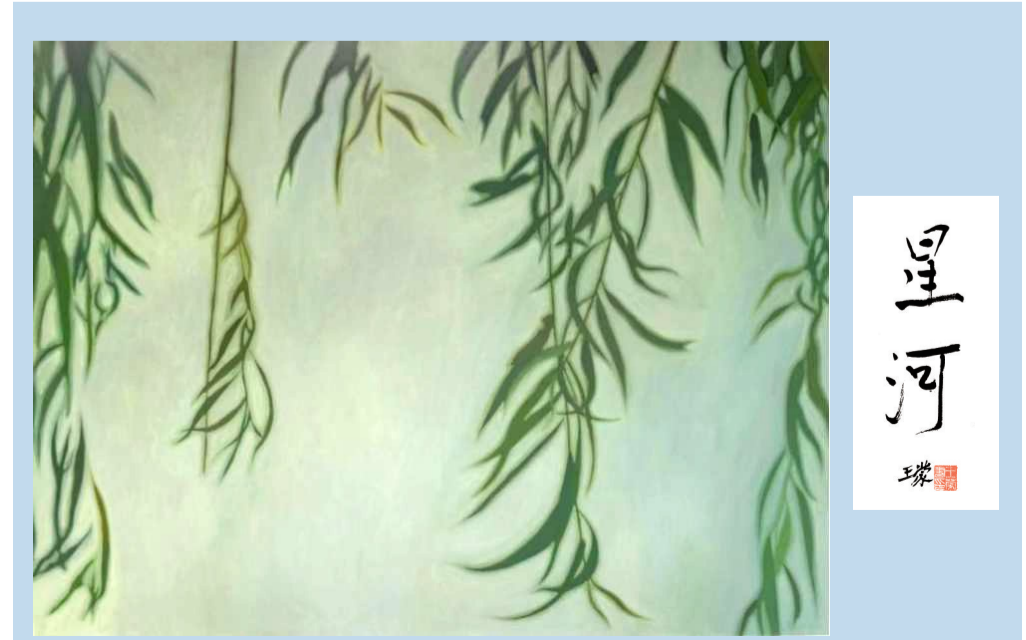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小说是小说,与实际情况相关,但并不完全相同。为此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就《围城》一书说过一段话:“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,不过他们说,作者创作的人物和故事,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。这话当然很对。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: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,就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,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;没有火就没有光,但光照所及,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。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,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。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,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;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,也不容易。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,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,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,而且是怎样的联系。”

《围城》里的宁都引发如此之多的故事,可见对钱锺书的印象有多大多深。

钱锺书对宁都的缘还有后续,他在上世纪50年代编选的《宋诗选注》一书,可以说是宋诗选本中最好的之一,胡适先生曾评价说:“注确实写得不错。”这本书中选了三位赣州诗人:曾几(赣县)、王质(兴国)、萧立之(宁都)。他称曾几的一部分近体诗“活泼不费力,已作了杨万里的先声”;他评王质道:“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,名声比他响得多,而作品笨拙,远不如他”;他选了五首萧立之的诗,道:“这位有坚强的民族气节的诗人没有同时代的谢翱、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,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。南宋危急的时候,他参与过保卫宋朝的战争;南宋灭亡后,他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……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,自成风格,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,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”。钱锺书先生把宁都萧立之从宋朝众多诗人中挑出来褒奖,发掘其艺术与思想上的特点,令世人尤其读者眼前一亮,擦亮了宁都文乡诗国独有的品牌!

钱锺书虽然一生只经过一次宁都,是宁都的一名匆匆过客,却留下如此财富,实属宁都之幸、文乡诗国之幸!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钱锺书先生的博学、敏锐与执着,也可以看出宁都历史文化的富有与丰饶,就像电波一样,总能给文人墨客、学者才俊带来启迪。

沧海桑田。如今,钱锺书当年下车歇脚的“陶陶旅馆”和周边的山坡枫林、三官殿早已被岁月剥蚀,不见了踪影,但人文底蕴永远镌刻在广袤的翠微大地,文乡诗国名副其实。



拂风 蒋衢阳 作